

井冈山精神研究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江西省井冈山精神研究会 编著
中共井冈山市委

主 编 范仁英
副主编 罗克卿
林玉清
冯竹强



中共党史出版社

井冈山精神研究

主 编 危仁最

副主编 罗炎卿 桂玉麟 马仲强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3年·北京

(京)新登字 071 号

井冈山精神研究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江西省井冈山精神研究会
中共江西省井冈山市委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通讯处：北京 1929 信箱 邮编：100091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宫门前甲 10 号

电话：(01)2581570 传真：(01)2581532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南 昌 水 文 印 刷 厂

850×1168 毫米 32开 7 印张 170千字

1993年7月北京第1版 199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数：2000册

ISBN 7-80023-702-8/D·94

定 价：5.50元

前 言

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本由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江西省井冈山精神研究会和中共井冈山市委合编的研究井冈山精神的专著。在全党、全国人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这本书的编写、出版，无疑是很有益的。它有助于广大读者深入了解井冈山精神的形成与发展，井冈山精神的科学内涵，井冈山精神与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弘扬井冈山精神的重大意义等；同时它联系实际，阐述革命传统既要继承又要发展的关系，旨在把井冈山精神和改革开放以来焕发的新的时代风貌结合起来，熔铸成新的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并把它贯注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形成强大的凝聚力，有力地推动改革和建设的顺利进行。

井冈山精神蕴含丰富而深刻的内涵。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培育的光荣的山井冈革命传统，是我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井冈山精神，实行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样需要发扬井冈山精神。

半个多世纪以来，井冈山精神在中国的大地上不断得到发扬光大，不断注入新的内容，不断展现时代特征的风貌。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大庆精神、雷锋精神、好八连精神，无不闪烁着井冈山精神的光辉，是井冈山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绽开的一朵朵艳丽的鲜花。井冈山精神的继承、发扬，促进了革命和建设的深入发展，推动了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一直激励着广大党员、群众开拓进取，矢志不移，不断创造共和国的辉煌业绩。

当前，全党、全国人民高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在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重要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精神的指引下，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统一，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迎来社会主义事业更加明媚的春天。改革和建设，呼唤着井冈山精神，呼唤着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本书的问世，将为推动改革开放的发展发挥应用的作用；并使井冈山精神的研究与宣传取得更大的成果。

研究与宣传井冈山精神，使这一珍贵的精神瑰宝焕发新的光彩，一直是党史理论工作者的心愿，并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井冈山精神研究》是国内出版的第一本全面论述井冈山精神的专著。它既是研究井冈山精神的成果，也是学习、宣传井冈山精神和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读物。希望它能在社会上引起反响，获得广泛的支持和欢迎。

目 录

第一章 井冈山的斗争——中国革命的新方向	1
第二章 井冈山精神的形成	23
第三章 井冈山精神的科学内涵	43
第四章 井冈山精神的发展	69
第五章 井冈山精神与现代化建设	97
第六章 井冈山精神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122
第七章 井冈山精神与执政党的建设	152
第八章 新时期井冈山精神的弘扬	183
后 记	209

第一章

井冈山的斗争——中国革命的新方向

第一节 革命道路的探索与引兵井冈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为挽救革命，探索正确的革命道路，于1927年下半年发动了南昌起义。起义军南下广东，打算再度北伐。与此同时，党在大中城市组织工人罢工、市民起义；在农村发动武装暴动，力图夺取武汉、广州、长沙等中心城市。但这些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暴动先后失败。中国革命的危机在不断加剧。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斗争中，毛泽东将马列主义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在湘赣边秋收起义部队会攻长沙未果后，果断地引兵井冈，率先将革命的重心由中心城市转向广大农村，踏上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革命道路。

1927年春夏，蒋介石、汪精卫反动集团相继背叛革命，实行“分共”和“清党”，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国内政治局势急遽恶化。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途夭折，中国南部数省陷入一片腥风血雨之中，国民党反动派用法律、行政、特务等手段残酷地镇压革命活动，集中一切反革命势力向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进攻。党的许多优秀干部、群众运动的领袖、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党外革命人士惨遭杀戮。据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反动派杀害的达31万多人，共产党员的数量从大革命高潮时期的6万余人骤减到不

足1万。各地原来蓬勃发展的工会和农民协会被查禁或解散，工农运动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走向低谷。许多地方的党组织被打散，不少党员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党内和团内的一些不坚定分子纷纷脱离组织，有的甚至引领反动军警搜捕共产党人，保留下来的党组织被迫全部转入秘密活动。在这极其险恶的局势下，党的队伍中的一些人在政治上、思想上陷入混乱状态，党内普遍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消极情绪。

大革命的失败，使国内阶级力量重新组合，民族资产阶级追随大资产阶级退出革命营垒，上层小资产阶级也发生动摇，脱离革命，反革命势力已经大大超过了共产党所领导的有组织的革命势力。但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不仅一个也没解决，而且愈加尖锐化。面临严峻的现实，中国共产党时刻有被敌人瓦解和消灭的危险。要不要坚持革命？如何坚持革命？成为当时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两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尚处在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缺乏思想和物质准备，没有前例可鉴的情况下，又一次开始了对革命道路的探索。

1927年7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明确提出，农民武装可以上山或投到同党有联系的军队中去。他深刻地指出：“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上山可以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但这个有真知灼见的意见，当时并没有受到重视。

为迅速扭转颓势，7月中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派遣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赴江西九江，准备组织中共在国民革命军中的一部分力量，联络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重回广东，以实现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7月20日左右，因发现张发奎已站在汪精卫一边，李立三等立即抛弃了依赖张发奎的幻想，决定独立发动反对南京和武汉的国民党政府的军事行动。中共中央在获悉李立三等人的提议后，正式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八一起义的枪声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新时期的开始。这次起义像一声春雷，使千百万革命群众在经历了一系列的严重挫折后，又在黑暗中看到了高高举起的火炬。南昌起义企图重走北伐战争的道路，因而先胜后败，教训深刻。周恩来在总结这一历史经验教训时指出：“当时武装暴动的思想，不是马上就地深入农村，发动土地革命，武装农民”，“它用国民革命左派政府名义，南下广东，想依赖外援，攻打大城市，而没有直接到农村中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这是基本政策的错误。”南昌起义的经验和教训再次警醒了中国共产党人，武装斗争是必需的，但要想达到成功，则一定要选择正确的革命道路。

南昌起义爆发不久，中共中央于8月7日在湖北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审查和纠正党在大革命后期的右倾机会主义严重错误，决定新的路线和政策。会议旗帜鲜明地清算了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着重指出：它在同国民党的关系上，完全放弃了共产党自己的独立的政治立场，一味妥协退让，“没有想着武装工农的必要，没有想着造成真正革命的工农军队”，而且“受着国民党领袖恐吓犹豫的影响，不能提出革命的行动政纲来解决土地问题”。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这是党在探索正确的革命道路上用大量的鲜血为代价换来的结论。出席这次会议的毛泽东在发言中突出地强调：“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毛泽东的这个意见，切中要害地指明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指出了日后斗争的正确方向。八七会议为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跨出了新的一步，但由于受到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左”倾思想和党内“左”倾情绪的影响，这次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时没有防止“左”的错误，反而容许和助长了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倾向，对于革命处于低潮形势下党应当组织必要的退却缺乏认识，容许和助长了盲目发动工人罢工和组织城市暴动的倾向。这

种“左”倾情绪后来进一步发展，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新的危害。

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派出许多干部到各地传达会议决议，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实施8月3日中共中央制定的《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准备在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基础较好的这四个省举行秋收起义。此后，江西的星子、万安、弋阳、横峰、赣县，广东的海陆丰、广州和琼崖地区，湖南的宜章、醴陵、桑植、平江、长沙，湖北的黄安、麻城和洪湖地区，福建的平和、龙岩、上杭、永定，以及陕西、河北、河南和江苏等省，爆发了规模不等的武装起义。这些暴动以攻占中心城市为目标，大多相继失败，新的革命高潮并没有如期到来。经过这些尝试，党内越来越多的同志开始认识到，在敌我力量悬殊，中心城市反动势力强大的现实情况下，只有到受过大革命风暴影响的农村去，才会有发展革命的广阔天地。这些起义中保存下来的一部分革命武装转入了农村，开展游击战争，为后来建立和发展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1927年11月9日到10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提出，在共产党领导下，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坚决领导农民暴动，实行农村割据，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耕种；组织工农革命军，开展游击战争。在此同时，会议也提出了一套“左”的理论和政策，使革命道路的探索又一次陷入了迷津。

11月中旬到12月中旬，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开始在各地贯彻。武汉、长沙、上海等大城市中的少数工人和积极分子奉命举行罢工斗争，但很快被镇压下去。广州起义虽取得暂时胜利，又因领导者没有及时地把革命武装撤出中心城市，最后也以惨痛的失败而告终。在这期间，有些地区还发生了强迫工人罢工，农民暴动盲目烧杀的情况，使党在这些地区一度严重脱离了群众。农村的武装起义只有少数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多数没有成功，或者根本没有发动起来。

历史实践证明：当国民党新军阀在大中城市建立了强大的统治，相对弱小的革命力量不可能在城市平安存在和顺利发展。党内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愤怒而加强起来的革命急性病，不仅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反而大大折损了革命的可有力量。

在革命道路的探索中，率先闯出迷雾的是毛泽东率领的湘赣边秋收起义队伍。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到湖南改组中共湖南省委并领导湘赣边秋收起义。1927年9月9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以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湖南平江和浏阳农军、湖北崇阳和通城的农民武装、江西安源路矿工人武装为主力，共计5000余人，发起了震撼全国的湘赣边秋收起义。起义军最初也以夺取湖南的中心城市长沙为目标，从破坏汉粤铁路开始行动。11日，起义军分别从江西的修水、铜鼓、安源等地出发，进入湖南境内，会合平江、浏阳地区的起义农民，准备会攻长沙。长沙近郊农民万人左右也参加起义。起义军曾一度占领了醴陵县城和一些集镇，但由于反动军队的力量远比起义军强大，各路起义队伍先后遭受严重挫折，夺取长沙、建立中心城市革命政权的目标无法实现。这时，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当机立断地改变原有部署。9月14日在浏阳东乡上坪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命令起义部队迅速到浏阳文家市集中。9月19日，在浏阳文家市举行前敌委员会会议，经过激烈辩论，否定了一部分人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的主张，决定迅速脱离平江、浏阳地区，进入江西境内，沿罗霄山脉南进，在敌人控制比较薄弱的山区寻求立足之地，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

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秋收起义军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是在会攻长沙建立城市政权的计划受挫的情况下采取的正确抉择。随后，毛泽东又引兵井冈，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从而找到了革命力量发展的正确方向，开始了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到农村的

转移，从实践上最先开辟了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实现了我党历史上具有伟大意义的转折。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在大革命失败后的黑暗岁月里，点燃了光照未来的星星之火。从此，中国革命向着一个新的方向，跨出了走向胜利的关键一步。

第二节 井冈山的斗争

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秋收起义部队挺进井冈山，在与朱德等率领的八一南昌起义军余部会师后，战胜了敌人的多次“会剿”，经过艰苦奋斗，成功开辟了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井冈山红色政权。

井冈山雄踞于江西、湖南两省交界的罗霄山脉中段，横亘在江西的宁冈、永新、遂川、莲花和湖南的酃县、茶陵等县境内。这里远离国民党重兵把守的南昌、长沙、武汉等中心城市，反动统治势力比较薄弱。大革命以来，党在这里建立了基层组织，组建了农民自卫军，奠定了农民革命运动的深厚基础。这里物产丰饶，便于解决给养；山高林密，易守难攻；进可威逼湘赣两省，退可回旋于崇山峻岭；具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良好条件。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于9月20日离开浏阳县的文家市，开始沿罗霄山脉南进，当行至萍乡芦溪时，遭敌袭击，部队受重创，总指挥卢德铭牺牲。25日，部队攻占莲花县城。29日，到达永新县的三湾村。根据中共江西省委的情况介绍，前委派人与宁冈县党组织和井冈山地方武装袁文才都取得了联系，并决定在三湾对部队进行改编，将秋收起义部队由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番号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共700余人。

10月3日，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到达宁冈的古城，当日召开前委扩大会。会议总结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讨论和决定了在罗

井冈山中段建立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及团结、改造袁文才、王佐两支井冈山地方武装等问题。6日，毛泽东在宁冈的大苍村会见了袁文才，赠送给他100余支步枪。袁文才也当即允诺帮助工农革命军进驻井冈山，并资助银元近千元。7日，工农革命军到达宁冈的茅坪，在当地设立留守处和医院，妥善安置了伤病员。随后，毛泽东在井冈山的大井会见了王佐，送给他70支枪，王佐欣然拨500担谷子给工农革命军作军粮。27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抵达井冈山的茨坪。

在中共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从1927年10月到1928年2月，湘赣边界地区恢复和建立了茶陵、遂川、宁冈、永新4个县委和酃县特别区委、莲花特别支部，工农革命军发展为两个团，并帮助地方建立了赤卫队、暴动队等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打土豪筹款子的游击活动；革命武装先后攻克了茶陵、遂川、宁冈3个县城，并分别在当地成立了县级工农兵政府，形成了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开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与此同时，朱德、陈毅率领八一南昌起义部分部队辗转于湘粤赣边，并组织发动了湖南暴动。因强敌进攻，主动撤出湘南，分两路向井冈山转移。毛泽东率部在桂东、汝城和酃县城郊与敌激战，掩护湘南部队安全转移。4月28日，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与朱德率领的队伍在宁冈砦市会师。5月4日，胜利会师大会在砦市广场举行，宣告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红四军）正式成立，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红四军下辖3个师9个团。朱毛两军会师壮大了边界的革命武装力量，加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发展。

为适应边区斗争的需要，经湘、赣两省委批准，1928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宁冈茅坪主持召开了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湘赣边界第一届特委会，毛泽东任书记。特委统一指导边界的斗争，下辖宁冈、永新、遂川、莲花、酃县5个县委和茶陵特别区委。大会以后，边界各县、区、乡党的组织

普遍建立起来。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震惊了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调集湘军吴尚第八军、赣军杨如轩、杨池生两个师分别从湖南的攸县、安仁、茶陵、酃县，江西的吉安、永新、莲花、遂川等地，对井冈山发动了第一次“会剿”。毛泽东、朱德审时度势，采取以守势对湘军，以攻势对赣军的策略，于5月上旬在五斗江击溃赣军一个团，缴枪300余支；随后在草市坳歼灭赣军一个团；又于6月23日在新、老七溪岭和龙源口歼敌一个团，击溃两个团，缴枪千余支。第一次反“会剿”大获全胜。

在军事斗争不断取得胜利的同时，边界地区的各项工作也都蓬勃发展起来。永新、莲花、酃县先后建立了县、区、乡工农兵政府，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也于5月间在宁冈茅坪苍边村建立。各县普遍开展了分田运动。并在县、区建立赤卫队，在乡建立暴动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进入了全盛时期。红色割据区域包括宁冈、永新、莲花3个全县，吉安、安福各一部分，遂川的北部、酃县的东南部和茶陵的西南部，总面积为7200余平方公里，人口50余万。

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也曾两次出现曲折，给井冈山根据地造成很大损失，史称“三月失败”和“八月失败”。

8月30日，敌军4个团围攻井冈山黄洋界，不足1个营的红军在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凭险抗击，浴血奋战，保卫井冈山军事根据地。9月13日，毛泽东率红军大队攻克遂川县城，俘敌营长以下200余人。此后，红军收复宁冈，再克遂川，在宁冈睦村和酃县沔渡击溃湘军一个团，在宁冈新城和龙源口连战皆捷，恢复了边界割据，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会剿”。

敌人的长期严密封锁与“三月失败”和“八月失败”给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带来了极大困难，食盐、布匹、药材奇缺，生活必需品极端匮乏。边界军民在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下迎难而上，自力

更生，创办了被服厂、造币厂和红色贸易圩场，战胜了敌人的经济封锁。

1928年10月4日，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宁冈步云山召开。

1928年11月2日，湘赣边特委收到党中央同年6月的来信。这封信全面论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肯定了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计划，提出了深入土地革命，改造整理军队，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以此为基础向四周发展的总方针，指示重新组织前委，并指定了负责人。6日，特委在井冈山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中央来信，重新组成以毛泽东为书记，朱德、谭震林、宋乔生和毛科文为委员的边界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前敌委员会。前委统一领导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并指导永新、宁冈、莲花、遂川、万安、茶陵、攸县、酃县等县地方党组织的工作。25日，毛泽东在宁冈茅坪写完了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井冈山的斗争》这一光辉篇章。

1928年底，湘赣两省敌军策划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会剿”。值此危急时刻，彭德怀、滕代远按照湖南省委的指示，率领平江起义后组建的红五军四、五纵队，冲破敌人重重阻截，于12月10日到达宁冈新城，与红四军主力胜利会师。

为粉碎敌人更大规模的“会剿”，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等率领主力3600余人出击赣南，迂回敌后，打击敌人；彭德怀等率领红五军和红四军的32团留守井冈山。1月26日，敌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起进攻。彭德怀、滕代远、王佐等领导井冈山军民与敌激战数昼夜。由于敌我力量悬殊，黄洋界、八面山等哨口相继失守。在四面受敌、孤军无援的情况下，为避免更大损失，按特委决定，彭德怀、滕代远率千余人向遂川方向突围，何长工、王佐、李灿率部分队伍转入深山，坚持斗争。敌人占领井冈山的大小五井之后，叫嚣“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实行残酷烧杀，边界各县的党和政权组织都遭到严

重破坏。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湘赣两省敌军主力撤离边界。何长工、王佐、李灿不失时机地率部与挨户团激战。很快收复了大小五井和宁冈部分地区。在湘赣边界特委领导下，各县迅速恢复了党组织，并抽调武装组成湘赣边界红军独立第一团，先后打垮了宁冈砦市、古城，茶陵尚庄，永新潞江之敌，粉碎了茶、永、酃、宁4县反动武装对九龙山的联合“会剿”，收复了宁冈、莲花等地。5月初，红五军奉红四军前委之命返回井冈山，恢复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至同年底，永新、莲花、宁冈3个县，酃县、遂川两个临时县委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茶陵、攸县也分别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党员发展到5000多人，边界各县地方武装除袁文才、王佐部队外共有枪500余支。特委根据江西省委和中央9月间先后来的指示信，领导边界军民运用更灵活、有效的方法开展斗争。

为适应赣西、赣南迅猛发展的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1930年2月7日，毛泽东在吉安陂头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红四、五、六军军委，赣西、赣南特委联席会议。会议确定党的任务是深入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和发展工农武装，将前委扩大为四、五、六军及赣西南、闽西、东江、湘赣边界等地区斗争的指导机关，毛泽东任书记。会议决定，赣西、赣南、湘赣边3个特委合并为赣西南特委，下辖4个行委，原湘赣边特委管辖的区域由赣西南特委的西路行委管辖。此后，湘赣边界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第三节 井冈山斗争经验荟萃

井冈山的斗争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突破了以城市工作为中心的模式，第一次成功地实现了把革命的重心由城市向农村转移，使一再受挫的革命力量找到了正

确的发展方向。井冈山的斗争为中国革命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集中体现在工农武装割据、党的建设、红色政权的建设及人民军队的建设等方面，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些经验由毛泽东加以总结和提炼，形成了一整套革命理论和策略思想。井冈山斗争的经验不仅成为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基础，而且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一、“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实践与升华

“割据”主张萌生于八一起义失败，攻打长沙不克，中心城市革命政权一时难以建立的现实情况之下。1927年10月下旬，中共湖南省委在《湖南紧急会议决议案》中首倡：“在最近一、二月内即应创造一农民暴动割据的局面，为将来全省农民暴动的重镇”。同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在《致两湖省委信》中第一次明确要求地方组织“集中力量割据某县或数县”。这时，“割据”已作为一种新的斗争策略提到了全党面前，但对其实质及方法的理解则是非常粗浅的。“割据”主张的实施与理论升华应归功于毛泽东。毛泽东在引兵井冈的伟大斗争中，第一个成功地实践了“割据”主张，并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真正形成了科学的、完备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和理论。

自1927年10月工农革命军到达宁冈的古城后，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畏艰辛，巧用奇兵，率领湘赣边区军民，出宁冈，攻茶陵，入遂川，占永新，连破数县。在不足一年的时间里，在永新、宁冈、莲花3个全县，以及吉安、安福、遂川、酃县、茶陵等县各一部，建立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红色政权，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总面积一度达到7200余平方公里，人口达到50余万。在四周严重白色恐怖的环境中，在大革命失败后的黑暗岁月里，井冈山的斗争像熊熊燃烧的火炬，给人民带来了希望，给全党带来了生机，其辉煌成就及巨大影响迅速扭转了中国革命的颓势。

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